

# 邓小平领导军队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宋毅军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北京 100017)

〔摘要〕 回顾和深入思考 1975 年开始的军队整顿直至 1977 年进行的军队拨乱反正,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罪行, 必须从思想上清除“两个凡是”, 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作风, 从组织上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平反冤假错案, 为实现军队的革命化而奋斗; 必须重新确立军事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 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 提高部队战斗力, 建立起适应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的后勤保障体系, 为实现军队的现代化而奋斗; 必须搞好军事管理工作、国防军工企业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工作、后备力量民兵建设工作的拨乱反正, 为实现军队的正规化而奋斗。

〔关键词〕 邓小平; 军队现代化; 拨乱反正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921(2016)06-0124-13

DOI:10.16870/j.cnki.51-1763.2016.06.018

从 1975 年开始的军队整顿直至 1977 年进行的军队拨乱反正,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当时, 担任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 辅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 领导全军开始整顿。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 领导军队深入开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组织上的清理整顿, 军事上突出教

育训练的战略地位, 优良传统作风的迅速恢复, 努力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所有这些重大历史性变化, 成为新时期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和国防建设现代化的基本发端。认真回顾和深入思考这重要的历史一页,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从 1959 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 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 他和

〔收稿日期〕 2016-06-20

〔作者简介〕 宋毅军 (1957), 男, 山东威海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中国法学会会员,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会员、毛泽东研究分会理事, 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邓小平、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

“四人帮”乱军篡权的罪恶活动，给军队建设带来了全面深重的破坏。而邓小平参与领导的1975年军队整顿，是军队乃至全国各项工作全面整顿直至后来拨乱反正的历史先声和突破口，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后来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果使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的各项工作计划未能全面贯彻落实，军队整顿也被迫中断，明显好转的军队工作秩序再一次被打乱。但是，“军队要整顿”的思想，<sup>①</sup>对军队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军队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全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各种形式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部分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为军队建设拨乱反正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时，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已被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接受、拥护。他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笔者结合编辑《邓小平军事文集》体会，主要对邓小平这一时期领导拨乱反正的生平和思想进行研讨。

## 一、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拨乱反正，为实现军队的革命化而奋斗

### （一）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作风

1. 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罪行，是军队拨乱反正的首要步骤。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精神，

从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人民解放军用两年多时间、分三个战役，系统地集中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反革命罪行。邓小平始终关注并正确地领导着这场斗争。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这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进行到底的一项重大战略步骤。事实证明，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进行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鉴于揭批林彪、“四人帮”已经基本取得伟大胜利，邓小平于同年9月17日在东北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和师以上干部时，又及时提出了搞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五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第二，消除和根除派性；第三，使地方和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的样子；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他还站在战略的高度敏锐地指出：解决上述问题“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没有目的，搞成形式

<sup>①</sup>参见《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军队要安定团结》（1975年1月19日）、《军队要整顿》（1975年1月25日）、《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1975年8月3日）、《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1977年8月23日）、《把军队整顿好建设好》（1977年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等等。

主义，这也不行。”他强调运动目的，是“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sup>[1]</sup>回到北京不久，他就嘱咐军队有关部门负责人把这五条先在机关干部中间讲一讲。根据邓小平建议，中央军委于11月28日转发总政治部《关于结束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意见》，指出全军范围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除少数单位外，在年底前可以基本结束。要求全军团以上单位根据这五条标准对照检查，强调的重点是第一、二条，也就是邓小平当时指明的重点。年底，全军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

2. 清除“左”的指导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军队拨乱反正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从1977年3月开始，全军结合实际开展了“十个应该不应该”教育的活动，体现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根本要求，为全面加强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关于在军队内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同“两个凡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没有恢复工作时，就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sup>[2]</sup>，他还在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此后，他多次这样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从而为全党全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尖锐地批评一些人“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

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sup>[3]</sup>。重申毛泽东关于“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sup>[4]</sup>的正确观点，号召全党全军“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sup>[5]</sup>。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叶剑英、李先念等也都积极支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在邓小平等指导下，解放军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先后发表文章和讲话，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开始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后来，他又讲：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全军又普遍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这次补课以团以上党委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主要采取召开党委扩大会，办读书班，短期离职学习等方法进行；对基层单位的干部战士进行正面教育。广大指战员思想进一步解放，这对各方面的拨乱反正，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组织上进行清理整顿，是军队拨乱反正的基本保证。1977年12月，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

上强调指出：“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军队干部不纯，祸害很大。所以，这一点对于军队极为重要。”<sup>[6]</sup>据此，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首先查清他们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重大事件，进而清查与之有牵连的人和事，最后定案作组织处理，以纯洁和巩固部队。同时，还于9月召开全军揭批“四人帮”清查工作座谈会，拟定了《清查工作12条》，对清查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方针政策、实施步骤及其他有关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到1985年6月，全军立案审查6406人，结案6380人，占立案数的99.6%。其中犯有罪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58人，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做组织结论的1071人，定为说错话做错事不做组织结论的5251人，受到党纪军纪处分的508人。<sup>[7]</sup>这一系列行动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全军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调整。1977年8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整顿军队，解决军队存在的问题，把军队搞好，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如果没有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因为领导班子没有调整好。”所以，“特别是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贯彻的”<sup>[8]</sup>。同年12月，他在军委全体会议上，又对领导班子的人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要求继续解决“软、懒、散”和

“消肿”问题。<sup>①</sup>认为1975年7月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涉及的内容很多，主题是讲整顿。“从整顿着手，也就是先从调整配备领导班子着手，把军队整顿好。”<sup>[9]</sup>然后再解决装备、战略方针问题。时隔两年的中央军委会议，主题相同，都是要整顿，首要的任务也都是调整配备领导班子。在此前后，他亲自领导主持对军队一些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工作。例如，邓小平在听取总后勤部负责同志汇报时就指出：各级领导班子、核心要害部门，要掌握在党性好的同志手里。他批示：“后勤问题复杂，不解决不行了。”并感慨地讲，总后多年以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不久，他亲自提议王平到总后勤部担负领导工作。1979年初，他亲自过问海军领导干部任命，派叶飞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邓小平更加重视各大军区特别是地处重要战略地位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他在讨论北京军区等领导班子配备时讲：现在第一步需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进行整顿，把作风搞正。中国有句古语：“新官上任三把火。”1978年9月，他在

<sup>①</sup>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和叶剑英主持调整军队大单位领导班子工作的报告，8月16日，邓小平把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报告和名单报送毛泽东，并附上军队22个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分配方案。他认为“这次调整基本上是好的，确定后还要做一些同志的工作。”毛泽东圈阅后，邓小平又于25日批转有关同志办理。这次全军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对稳定军队，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沈阳军区听取汇报时，诙谐地回忆起第三次复出的近一年中，自己参与对沈阳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过程，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这“三把火”分别为：

一是指1978年11月上旬在家里接见沈阳军区负责人甘谓汉时关于军区领导班子的讲话。他讲话指明：“四人帮”在沈阳军区搞了许多阴谋，需要把运动搞彻底，不留后患。“揭、批、查一定要抓紧，一个‘小螃蟹’也不能漏。”<sup>[10]</sup>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沈阳军区抓紧领导机关和部队中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重点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在东北和军区部队的罪行。二是指11月18日，邓小平等在广州听取军区负责人汇报后的谈话，他指出军区出了黄永胜等，“清查工作要搞好，不注意会留下后患，也不能教育帮助干部”<sup>[11]</sup>。三是指他于1978年2月2日在成都听取军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他严肃地指出军区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强调：“军队的问题，说来说去是把班子搞好。把班子配好，其他问题就好办。这是个方针。争取半年把班子调整好，半年不行，一年。成都军区解决不了，还有总政嘛。”<sup>[12]</sup>

据此，从1977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军委和军队一些大单位领导班子相继进行调整。这一果断作出并迅速付诸实施的重大举措，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军队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后，兵团级和军级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比例为53.2%；军区系统所属师级领导班子的军政一把手调

整的比例为46.7%。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更加纯洁，特别是配强军政一把手，增强了领导班子的核心作用，“软、懒、散”状况有了明显改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部队伍臃肿的问题。对于促进军队全面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2. 平反军队中的冤假错案，是军队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特别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又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军队政治生活和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为军队彻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条件。

据统计，全军“文革”中共判处各类案件1.25万起，到1979年6月底，复查了6407起，占51.2%。“文革”前判处的案件，已经提出申诉的有5369起，调查处理了1638起，占30.5%。军队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主要有：郭兴福、陈再道、彭德怀，“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干部战士，萧劲光，“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

萧华、黄克诚、李德生等平反，等等。包括普通案件在内，全军有2600余起错误案件得到了纠正，共有2.6万余人获得平反昭雪。许多因受到株连的干部、家属、子女，也得到平反和纠正。全军划为右派分子的实际人数为5885人，属于错划予以改正的5799人，占总数的98.5%；不予改正的29人，占0.5%；给“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帽子。对被划为中右分子的11039人也予以改正。<sup>[13]</sup>对全军被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17212人，均先后给予平反、改正，恢复原来级别待遇。至1981年6月，全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3. 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是军队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林彪、“四人帮”庸俗地对待毛泽东思想，大搞“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判开路”等错误做法，把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从基本原则、制度到作风、方法等，搞得混乱不堪。政治工作领域成为“重灾区”。因此，军队政治工作突出而又迫切的问题，就是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以全面恢复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提出要恢复政治机关的老传统，通过花几年时间，把政治机关的地位、作用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在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又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专门强调了纪律和团结问题。他还批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确定会议主题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

统，提高军队战斗力。

1978年4月至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拨乱反正期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6月2日，他到会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科学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等文件。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特别是邓小平重要讲话，对军队政治工作拨乱反正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 二、重新确立军事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为实现军队的现代化而奋斗

### （一）必须重新把军事教育训练提升到战略地位

教育训练是平时时期解放军经常性工作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大搞“突出政治”，使军队教育训练受到最严重破坏，军事院校大都被撤销；军队战斗力明显下降。“四人帮”煽动全军学“儒法军事思想斗争史”，把军事训练热潮又一次压了下去。为使全军在教育训练指导思想上实现重大转变，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从整军备战全局出发，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军深入进行教育训练领域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

到战略地位,<sup>①</sup>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军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重新明确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加强教育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军队怎样整顿、准备打仗、搞好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都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sup>[14]</sup>这一重要思想,指明了相对和平时期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根本途径,完全符合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他在三令五申教育训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还提出了如何落实的重要方针和原则。认为,这个方针具体化、制度化,主要必须从两个方面去做:一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在勤学苦练中学本领、练作风,学习现代战争知识,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二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把军队原有的学校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根据他的提议,中央军委决定设立11人组成的教育训练委员会,研究了院校数量、校址调整和干部配备,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调整和增建院校的报告》。各军区、各军兵种根据中央军委通知规定精神,也先后设立了教育训练领导小组。

在197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教育训练和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的思想。还提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新思想,使干部战士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军队和地方都能用的人才。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

定》等九个文件,中央军委随后颁发全军实行。该《决定》提出了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十项任务。邓小平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新思想,着眼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建设大局的双重需要,顺应军心民意,对加强军队建设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1978年12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出《关于部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全军把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列为部队教育训练的一项内容。从1979年开始,科学文化教育就被正式列入部队教育训练的内容。

为把我军传统练兵方法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搞好连队基础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1978年6月重新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号召全军运用1964年练兵比武的经验,再一次掀起

<sup>①</sup> 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他还针对军队实际情况尖锐指出:“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根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的指示,全军又迅速掀起以“三打”、“三防”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练兵热潮,军事训练再度出现好的形势。然而,“四人帮”掀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军队正在进行的各项整顿工作被迫停止,已见好转的军事训练形势再度遭到冲击破坏,邓小平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重要思想也未能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其恶果是不会指挥现代战争的问题普遍存在,作风涣散、纪律松弛,军队素质严重下降。

群众性练兵热潮。

突出干部训练和协同战术训练。1977年,全军集训营团干部和参谋2.3万多人,教导队轮训连排干部8.2万多人。各军区都组织了师以上干部集训,其中北京等军区集训师以上干部达2000多人。各部队紧密结合各自作战任务,组织了不同规模的首长机关实地演习或实兵演习。南京等军区围绕渡海登陆作战进行训练,组织了实兵演习。配合军区训练,海军进行了夺取制海权演练,空军进行了夺取制空权专题研究。沈阳军区组织了重点方向守备师坚守要点防御演习。北京军区空军组织了以保卫首都为背景的反空袭战役演习。铁道兵组织的团规模反轰炸线路抢修实兵演习,锻炼了部队实战抢修能力。11月中旬,总参谋部在武汉地区组织的电子对抗实兵试验演习,海军、空军、炮兵、工程兵等有关军兵种部(分)队21个不同建制单位参加,促进了部队战备训练,提高了各级干部在干扰条件下的指挥能力。据统计,仅1977年全军团以上首长机关现地演习和实兵演习就达500余次。

1977年上半年,航空兵部队连续发生严重飞行事故。邓小平指示空军:“飞机要普遍进行大检查,技术要普遍进行大检查。”7月29日,空军党委做出开展“两个大检查”的决定,组成17个检查组深入部队进行飞行技术、飞机装备大检查。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事故减少了40%。10月12日,为检验基础训练成果,空军部队在河北杨村机场为邓小平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作了战备训练汇报表演。上述全军军事训练的这些整顿、调整和恢复,为军队工作重点转移后,深入进行教育训练改革,

全面开创教育训练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二) 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提高部队战斗力

搞好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建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科学编制体制,是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基本保证,也是我军取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1. 要把“消肿”作为军队整顿的首要任务。1977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多次强调要继续精简整编,<sup>①</sup>改革体制。12月,他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尖锐地指出: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臃肿的情况很严重。所以,“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sup>[15]</sup>。这次军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充分肯定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和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的原则,确定继续完成当时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并决定铁道兵、工程建筑部队(不包括舟桥、野战工兵部队)不计入军队定额。但同时,要有计划地增加部分员额,重点保证航空兵、舰艇、导弹、电子对抗等部队的发展,加强院校、科研机构,等等。同时还规定1975年的精简方案,

<sup>①</sup> 1975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军队整顿问题,确定了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3年内将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精简整编任务实际上没有完成。



仍应抓紧落实,争取于1978年基本完成。上述精简整编方案,全军从1978年开始实施。

2. 必须迅速恢复和增加建设军事院校。军队院校担负着训练、选拔和推荐干部的任务,是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办好院校是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解放军共建立起125所各级各类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合理的院校体系。“文革”开始以后,林彪提出调整院校体制,结果将全军82所院校撤销,仅剩下43所,全军艰苦创建的完整的院校体系被搞得残缺不全。解放军只好以教导队作为训练干部的过渡形式。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军委把军队院校的恢复、增建重新提到战略地位,强调要把干部放到学校去培养训练。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经过训练,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sup>[16]</sup>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重申,为具体落实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一方面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方面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要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明确要求,学校要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军队院校基本职能和根本任务的科学概括,指明了新形势下军队院校建设的方向。1977年9月,邓小平提议的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成立以后,遵照

他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指示,为加快恢复和增建军队院校,在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上,教育训练委员会于同年10月向中央军委提交《关于调整和增建军队院校的报告》。11月,中央军委批转这个报告。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作出的《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标志着军队院校教育的地位重新得到肯定,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军队院校的迅速恢复和增建。1978年1月,以培养高层次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干部为主要任务的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分别成立。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6月6日,长沙工学院改建为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列入解放军序列,归国防科委建制领导。这对促进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三) 必须建立适应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要求的后勤保障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就确立了“为国家负责,为军队负责”的后勤建设指导思想。但是,“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1975年军队后勤工作在整顿中逐步恢复发展的良好转机也被迫夭折。

端正后勤建设指导思想,整顿和改进后勤工作。197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把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之一,号召全军各级党委要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建设。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军队后勤建设指导思想被概括为:勤俭办一切事业,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一切为部队服务,一切为战备服务,加速后勤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并得到邓小

平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批准。

在这次中央军委全体会议前后,邓小平对后勤整顿工作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整顿后勤工作要从整顿财经纪律着手,给部队带来一个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军队的农副业生产要搞好,军以下部队一律不办工厂,军队工厂平时以民用养军用,对所有企业进行大检查、大清理;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具体研究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以及全军家当的增大,怎么搞好后勤供应和管理的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军队后勤需要整顿的问题,对加强后勤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1977年11月,总后勤部召开科学大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后勤科研工作的成绩和经验,讨论后勤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并举办了后勤科技成果展览。总后勤部还提出了“建设一个随时能够打仗,并能保证战争胜利的现代化后勤”的具体目标。1978年4月至6月,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后勤会议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会议着重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军队后勤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是后勤战线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军后勤会议。会议正式向全军明确提出的后勤建设指导思想,标

志着全军后勤实现了后勤建设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为全面整顿后勤业务指明了方向。

与此同时,为了调整后勤编制体制,理顺业务管理关系,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从1977年起,全军后勤系统采取组织整顿和业务整顿相结合的办法,从恢复和制定后勤各专业规章制度着手,对后勤组织和业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从后勤思想、组织、业务、战备等方面,恢复了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了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各方面工作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为从组织上保证中央军委关于整顿和加强财务工作决定的贯彻执行,1978年全军团以上单位相继恢复财务管理机构,标志着全军各级财务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 三、努力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军队的正规化而奋斗

在开展拨乱反正,努力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为实现军队的正规化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很多重要思想。

(一) 必须搞好军事管理工作的拨乱反正,通过各种训练,使军队迅速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

1. 邓小平亲自领导华北军事演习和阅兵。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听取华北军事演习和阅兵方案汇报后指出:“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搞这么一次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

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要搞一次。他明确指示: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把军队摆一摆给人民看”,“这样加强了军民关系,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sup>[17]</sup>1981年9月演习结束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演习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他认为,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充分表明我军“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与此同时,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总要求:“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此,具体要求是六个“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sup>[18]</sup>;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

134

展“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事实证明,这次华北军事演习,是一次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经过充分准备,精心组织,协同准确,各方面工作有条不紊的演习。它标志着我军在提高军队协同作战能力、运用现代作战手段对付敌人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对此,邓小平给以充分肯定。

2. 领导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邓小平于1980年3月提出要恢复军衔制,随后,军队领导机关在8年内召开了有4万人次参加的上千次座谈会,将《军官军衔条例》先后修改了20余稿。可见,邓小平在恢复军衔问题是积极而又慎重的。1988年8月1日,在人民解放军中又恢复了军衔。这是邓小平为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又一重大的新举措。邓小平出席了授衔仪式并合影留念。

(二) 必须搞好国防军工企业的拨乱反正,使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工作迅速步入正常发展轨道

1. 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提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生产工作。主要任务是:从战略着眼,提出军队各个时期武器装备的要求;审议装备体制和武器装备的规划;统一领导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规划和实施;统

一组织武器装备的科研、设计、试制、试验、定型、生产、验收和交付使用；推广军队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引进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等，加速实现军队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为加快国防科技战线各方面工作拨乱反正的步伐，根据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相继对领导国防尖端技术的组织机构、各国防工业部门领导班子作了调整。

2. 调整武器装备发展计划。1977年10月和11月，邓小平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和有关部门领导人讨论武器装备发展问题，部署计划调整工作，决定首先用三年时间调整计划，完成原来确定的重点任务，并制定出国防科技发展的“六五”计划和2000年前的远景发展规划。强调确定武器装备的研制项目，要根据国家的经济能力，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优先安排研制、生产急需的武器装备；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要按照陆、空、海的顺序安排，重点抓好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歼击机、潜艇以及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战略核武器的研制，要首先集中力量搞出洲际导弹。

4. 确保武器装备质量。1977年8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尖锐地指出：军队的武器有问题，质量不行是要死人的，这是决定战争命运的问题，三年内要把国防工业整顿好。后来他又指出：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不好，根本不接收，要寸步不让。装备就是要求质量，要设军代表，要派好的。同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就发出了《关于恢复驻厂军事代表制度的通知》，决定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厂军事代表制度，加强军工产品的检验、验收。从此，军

事代表机构又恢复了起来，从而促进工厂全面开展质量管理，确保军工产品从论证、设计、试验、生产到使用等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把质量关，努力为部队提供合格的武器装备。经过近三年的持续整顿，主要武器装备的生产质量均有较大提高，基本扭转了武器装备产品质量不好的局面。

4. 要加紧研制新式武器。关于海军武器装备研制，中央军委确定仍以发展潜艇、导弹舰艇和反舰导弹、鱼雷等为重点。关于军事电子装备研制，邓小平提出要大力提高军事电子装备水平，规定军事电子装备研制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完成新一代产品的研制和生产，为三军建立通信、指挥、侦察等各项自动化系统，为各种武器装备包括“三抓”重点科研任务的配套设备提供先进的电子设备。同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国防科委提出研制亿次巨型计算机的报告。1982年11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亿次计算机，被命名为“银河”计算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上能够研制巨型计算机国家的行列，对于发展第二代战略核武器，开展新型航天、航空飞行器的研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必须搞好后备力量民兵建设工作的拨乱反正，恢复发扬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努力向正规化迈进

“文革”中，民兵建设同国家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遭到严重破坏。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民兵建设方针、原则及其成就，篡改民兵的性质和任务，破坏民兵工作的领导体制，妄图把民兵改造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粉碎“四人帮”以后，民兵建设面临指导思想上的

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此，1978年1月至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民兵政治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强民兵政治工作问题。会议总结交流民兵政治工作经验，分析民兵工作形势。邓小平对这次会议很重视，在会议筹备时就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把“四人帮”颠倒了路线是非颠倒过来，恢复老传统。并强调指出，我们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就是人民战争。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位置上来。民兵应该成为生产的骨干，做好本职工作，搞好战备。林彪、“四人帮”把军队和民兵的名誉搞坏了，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恢复与调整民兵的传统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民兵工作拨乱反正的又一个重要方面。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恢复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和省（市、自治区）、地、县（市）党委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根据邓小平提议，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徐向前等14人组成，徐向前为主任。

综上所述，邓小平领导军队拨乱反正，是他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要发端，他后来领导的百万大裁军、对台湾方略、走精兵之路等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过程是从1975年指导军队整顿开始，结果举步维艰，直至1976年被迫中止；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12月，军队拨乱反正在徘徊中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完成，开创了军队建设的新局面。第二，决定性的领导

作用是叶剑英、邓小平，而后者作用越来越显著，其他军队领导人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邓小平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战略区、野战军特别统筹是两大战略区的主要领导职务，新中国建立后担任中央军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务，直至1981年当选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队中的核心地位由此确立。显而易见，由他来领导军队的拨乱反正、实现军队建设历史性转折、开创军队和国防建设新局面，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呼唤。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思想应运而生。

#### 参考文献：

- [1] [6] [8] [15]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138—139，76，55，62，79，188.
- [2] [3] [5] [9] [14] [16] [1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114，119，72，60，41，395.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 [7] 邓力群，马洪，武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283.
- [10] 李德生. 李德生回忆录：上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483.
- [11]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39—240，262.
- [13]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 [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38.

（责任编辑 王丽娟）